Co-China 周刊

NO. 189
2014年2月6日

吴明益：给我暴民学生们的一封信 | 刘瑜：给女儿的信：愿你慢慢长大 |
菲利斯·里奇曼：一封52年后致哈佛教授的回信

致你們



编者的话

这是 Co-China 周刊第 189 期。在过去的 188 期周刊里，我们谈同性恋是什么、听恋童癖者无奈的自白，我们请台湾的朋友回答了大陆朋友提出的有关太阳花运动的疑问，也尝试解剖香港雨伞运动中有关国外分裂势力、香港的选举制度、殖民历史等问题。我们还共同分享了动人的声音、好看的书影，倾诉在亲密关系中发生的故事，记录了抗命者被捕的寒夜，还有公民为各自的理想生活所做的种种努力。我们参与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大数据的前景与危险、传统的美与不美、转基因食品的对与不对、死刑的存与废等等争论，你可能也会发现这些争论往往没有绝对的答案。

在这一个个具体的话题之外，这 188 期的周刊也呈现出不同的群体、个体之间沟通的样貌：有时候，不同群体之间甚至在一些基本事实的认知上都仍存在隔阂；有时候，人与人之间通过真诚沟通，从彼此身上寻得力量；有时候，人们走向难以实现认同的“割裂”——这种割裂不是因为错误的认识而导致，而是源于理念和立场的差异；又或因为人的生长背景和经历的不同，而导致的所谓的“代沟”。

这样种种景象，让我们意识到一座沟通不同群体和个体的桥梁仍十分必要。有明确对象、直接对话的书信或许是更有效的方式。Co-China 计划在春节后推出以“书信”为主题的新项目，我们将邀请相关的当事人和学者梳理介绍某些重大事件，普及某些基本的知识并答疑。同时我们也将向立场有所差异的双方，如父母 vs 子女、香港 vs 内地等等，征集他们对彼此的问题和想说的话。我们也将呈现亲人、朋友之间的情感沟通。

在这期周刊里，我们选取了几封书信，从澄清事实、解答疑惑到倾诉情感，再到表明立场与态度，它们展现了书信的各类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沟通，有意义的对话始终建立在一个前提下，即有自我对话的能力——反思自己本来所有的知识、理念框架，对已形成的东西产生疑问或渴望进一步的理解——如此，对话才不至于变成没有回应的“说出来而已”。因此在周刊的最后一部分，我们选取了周保松的《抗命者言（上）——我的自辩》。在多元的声音之中，对自己的选择进行不断的反思，反思之后能“择善而固执”，这是我们愿与你一同努力的方向。

目录

┣解┫

叶荫聪：香港政改风波——写给大陆朋友的一些事实与观点

“

一位大陆的熟朋友跟我说，他看了文章，也觉得‘晦涩’与‘有点隔’。中港沟通的确不容易。

”



叶荫聪，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讲师，香港独立媒体（InMediaHK）创办人之一.

按：这文章是写给大陆朋友的，我的朋友透过长微博发出去，半小时内被删除，加起来只有几百人接触过。后来，一位朋友透过微信再发，稍好，有过千人，但很快也被删除了。

除了官方审查的障碍，也有其他障碍。一位大陆的熟朋友跟我说，他看了文章，也觉得“晦涩”与“有点隔”。中港沟通的确不容易。

1. 基本法 23 条规定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行为，为甚么法学家贺卫方却认为人大要求特首爱国爱港不符基本法？

基本法 23 条的确禁止叛国分裂国家行为，但是，法律一般是制裁已发生的行为或策划之中的行动，在没有行为发生或策划之前，我们又凭甚么预设某些人就会叛国分裂国家呢？香港还没有就基本法 23 条立法（2003 年搁置立法至今），而基本法又规定有关立法将来由特区负责，现在谁有权去判定某人就是可能叛国分裂国家？在没有清楚原则，没有法，没有执法机关去调查，没有司法机关去判定下，要在特首的提名制度设计上把可能叛国分裂的人过滤掉是很荒谬的。

若果现在已有人进行叛国分裂活动，只要涉及暴力，或执法及司法机关认为危害公共安全，即使香港仍未有国家安全法，也有其他法例可以制裁。例如，有人买军火进行恐怖袭击，这本身便已是犯了非法藏有及管有武器、严重伤人、意图谋杀等等；同时，香港有



《公安条例》，针对危害“公共安全”的活动及组织。如果日后有参选特首选举者是犯法之人，根据现行《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犯罪（被判处 3 个月以上监禁）根本就会丧失参选资格，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在提名制度上花力气。

而且，人大常委说的不止是要排除叛国分裂国家的人， 而且是要求特首“爱国爱港”，根据任何“爱国”标准，不分裂国家的人也不一定是爱国的。香港的基本法没有这样的要求，“爱国爱港”的定义也不清晰，因人而异。在宣誓中你或许可以笼统地要求上任的公职人员效忠国家，但是，怎可能从制度设计上保证特首候选人符合一项这样不清不楚的条件呢？

2. 基本法之上还有宪法，宪法的爱国要求很基本，不是也应该适用于一国之内的香港吗？

香港的基本法制定本身以不违反中国宪法为原则，而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只要符合基本法便可，所以，就算中国宪法有爱国要求，对香港也没有太大法律上的意义。而且，退后一步，究竟什么叫爱国？

如果“爱国”是指“爱国主义”，其实只有宪法第二十四条：“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 ”，指的是政府会向人民灌输的官方意识形态。至于其他可能跟“爱国”有关的，通常是指一般公民及国民的责任，例如第五十五条：“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如果“爱国”是指这些，我们如何在没有侵略前，知道某人是否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呢？而更重要的是，宪法里没有指明中央或地方政治领导的选举或选拔制度，要在设计上保证选出来的人是“爱国”的。

3. 如果“爱国爱港”根本不应及不能成为提名标准，那为甚么人大常委会要强调“爱国爱港”？

在我看来，“爱国爱港”是一个中央用来合理化所谓“普选框架”的借口，即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合理化，根本与一个人是否爱国没有关系。

首先是提名委员会的组成。人大常委多次强调，提名委员会要参照过去选出特首的“选举委员会”（简称“选委会”）的人数及“四大界别”组成方式。若果人数及组成方式完全不变，那么，将来获得提名的人只会是中央政府指定的人。为甚么？

过去香港的特首都是由“选委会”选出的，香港市民没有权投票。在上一次特首选举中（2012 年），“选委会”有 1,200 委员，由他们选出特首。选委会内有“四大界别”，每个界别 300 人，包括：



工商界（内分 17 个界别分组）；

专业界（内分 10 个界别分组）；

劳工、社会服务及宗教界（内分 4 个界别分组）；

立法会、港区人大、政协当然委员，以及区议会全票互选代表（即 4 个界别分组）。

1,200 名选委由不足 25 万被认定为界别分组里的人选出，人数之少，占全港地区直选选民人数十分之一不到。同时，这四个界别里的选民成份复杂而不公平。例如，教育界（第 2 界别内的小界别）选民最多，有 8 万多人，只有 30 票；渔农界（第 3 界别内的小界别）选民只有 159 人，却有 60 票！事实上，第 1 界别，即工商界，选民只有 2 万 6 千人左右，却有 300 票。而且，这个界别里的所谓“选民”，很多是公司票，而不是个人。

中央及亲北京人士称这个制度为“广泛代表性”及“均衡参与”。一般政治分析认为，北京政府透过这个奇怪的界别选举，控制了大部份票。港区人大及政协委员不用说，工商界的 300 票也基本上全在中央掌握之中，因为，工商界都要依靠与中国的政商关系做生意，而专业界里除了个别界别（如教育界别），大部份专业亦有类似情况。甚至是社会服务及宗教界，亲北京政府的政党及社会团体也积极介入社会服务团体及宗教团体，把它们纳入自己的阵营。从而保证亲北京政府及为工商专业界接受的人士，可以当选特首。

清华大学法律学院教授王振民是人大常委的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虽然他经常为中央治港方针作辩护，但他在最近一次访问中说得很坦白，人大常委的普选框架，就是要保证工商专业精英能够参与，因为这些人控制了香港经济命脉。而他叫这为“先让一部份人民主起来”。

若果过去的选举委员会，或未来的提名委员会真的能反映民意，还勉强算是有道理。但是，根据过去经验，得出的结论是相反的。香港的反对派（泛民主派）在过去的选委会的选举之中，2007 年只取得 15.38%，2012 年更只取得 6.3%。这个比例完全无法反映全港市民的政治取向及偏好。以地区直选为例，泛民主派及建制派得票大概是“六四比”，最差的时候也平分秋色；在任何一个立法会选区中，无论输赢，泛民主派的得票也不会少于 15%。

因此，日后的提名委员会要过半数才能获得提名（所谓“出闸”），则泛民主派根本不可能会有候选人。其实，即使降至三分之一，泛民主派也极难“出闸”，而“过半数”的规定，连一切亲北京人士，若得不到中央允许，也无法“出闸”。换言之，提名委员会并没有起码的民意基础，但是，又被赋予权力，把具有相当民意基础的候选人排除掉。



正因为要维护这样不公平的制度，所以，中央政府才要搬出“爱国爱港”、“防止外国势力”、“国家安全”等理由，跟“均衡参与”及“广泛代表性”一样，都是用来粉饰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为一个本身没有合理理由的制度，找一些好像很有道理的理由。

4. 人大常委会强调特首要“爱国爱港”，就是不希望有一位对抗中央的特首，这是很合理的要求，一个特区首长怎可以对抗中央？

任何选举，其结果都有不确定性。如果选举的结果是预早知道的，那便不叫选举了。我们现在的确无法预计将来普选产生的特首的政治立场如何。

然而，即使特首“对抗中央”，是否便很可怕？首先，我们要讨论甚么叫“对抗”。如果“对抗”指的是推翻，不少人可能觉得可怕，可是我们看一下过去泛民主派的特首候选人，分别是梁家杰及何俊仁，前者是公民党，后者是民主党，两位从来没有提出过要推翻北京政府，更没有策划或做过推翻中央政府的事。论政见，他们在香港也属相对温和的派系。可以预见，未来泛民的候选人也是类似他们的人物。

何俊仁及其民主党许多成员，的确是“支联会”核心成员，在每年六月四日的悼念八九民运死难者晚会上，有喊过“结束一党专政”。我们不妨细心去想一下这句口号，重点是“专政”，他们反对及要改变的是一种不民主的统治方式，口号的下一句便是“建设民主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或计划要武力推翻中共，“支联会”成立了二十五年，只有和平的烛光晚会及游行。“结束”可以是和平方式，甚至可以由共产党自己来结束。他们对中国政治的看法，的确与北京当局不同；但是，既然是一国两制，共产党不直接领导香港（甚至没有公开的活动），为甚么不可以让香港的民选领导人与北京当局持有不同意见？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意见不合的例子，世界上多的是，这并没有甚么可怕。

况且，特首是选举产生的，他／她只可连任一次，不能永远领导香港，这次胜了，下次也会输，有轮替的可能。亲北京的政党并不弱，凭着财力及在地区的组织工作，加上北京政府的协助，有相当数量的支持者，并不输泛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中得到的议席更是压倒性的。北京政府为甚么会害怕一个对自己有利的选举？为甚么还不放心，要在提名阶段封杀任何自己指定以外的候选人？

5. 香港在殖民地时期为甚么不争民主，回归了之后反而要民主了？这难道不是“海外敌对势力”在背后作祟吗？

“海外敌对势力”是中央政府维护不合理提名制度的常用借口，中央从来没有具体指出是具体是甚么敌对势力。其实，回归以来，英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香港事务的兴趣已降到最低点，同时，它们与中国的关系改善了许多。例如， 2010 年，北京政府属意的政



改方案在立法会通过，美国政府马上公告表示欢迎，北京没有反感，香港亲北京媒体更高调报导“美国支持政改”。英国更不在话下了，前阵子有两位泛民主派人士去英国见政治人物，希望国际社会就香港政改给予北京一点压力，结果几乎找不到半点支持。英国与美国一样，只想跟中国做生意，又怎会关心这个小城的政治前途？

总体来说，香港的民主运动是自发的，并不是外来的。殖民地时期的香港也不是没有民主运动，香港的泛民主派就是 1980 年代开始慢慢形成，代议政制改革的呼声亦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此之前，亦有一些零星的政治团体，向英国争取香港民主改革。

如果说，香港民主运动有外来因素，最大的因素是中国。事实上，香港泛民主派出现，争取民主的风气的形成，一开始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政府接受“民族回归，民主治港”的口号，在基本法里亦定下终极普选的承诺，这些在社会科学里叫“政治机会”。当一个政权根本没打算民主化，争取民主的声音只会是少数。当打开了一线曙光，民间便会动起来，把握机会。

然而，回归之后，落实普选的时间表一拖再拖，本来说好是 2007/2008 年可以了，结果人大常委释法，又拖延了好几年。承诺未兑现的情况下，民众当然焦急，也对中央政府不满，产生了许多抗议行动。后来在民间多番争取下，中央才定出时间表。2017 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一度让人以为终于成功了。可是，新上任的特首又拖延政改谘询，后来又传出中央要在提名制度上设下重重关卡，令一人一票徒具形式，才使香港社会蕴酿出“占领中环”等行动。

同时，中国的政治控制却日渐渗入香港。例如，中联办大力介入香港选举，大洒金钱以及安插选民等手段，帮建制派取得大量“铁票”。另一个例子是媒体，香港大部份媒体已由亲北京商人控制，令香港的媒体自主被逐步蚕食。这都激起了香港人对政治的兴趣。

6. 有 140 万人签名“反占中，保普选”，也有数以十万人参与游行，说明不少人接受一个暂时可能不理想的方案（所谓“袋住先”）。为甚么有些人还是要“占领中环”，为甚么有议员提出，若特区政府政改方案不符合“国际标准”便要投票否决，破坏香港普选进程？

根据媒体调查，不少“反占中，保普选”的游行示威者根本不知“占中”或“政改”是甚么，部份人还被揭发收取酬劳来游行。就算抛开这些不谈，当参与者是真诚“反占中”的，它与 6 月 22 日公投的民意（近 80 万人认为，立法会要否决不符合“国际标准”的方案）的差别在哪里？前者，是要求接受北京的方案，接受一个排除相当多政见不同的候选



人的方案，一个让北京政府控制提名过程及结果的方案；后者则要求一个对各党派尽量公平的方案。这不是支持者人数的问题，是究竟哪个方案更公正的问题。

至于“袋住先”有甚么不好，我们大概可以预计，若方案通过，所谓一人一票选出的特首，将会是亲北京的候选人，甚至是北京政府钦点的。日后要修改特首选举方法，要遵守之前人大常委定下的所谓五步曲，第一步需由特区政府启动，进行谘询并向人大常委提交报告。期望一位亲北京或北京钦点的特首再次启动政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香港政制或会就此在“假普选”中不可自拔。而若原地踏步，维持原来 1,200 人小圈子选举，当然不会令香港更好，但是一些泛民主派人士认为这或能凝聚更大的民间力量迫使北京政府接受一个较为公平的制度。无论如何，香港的政改正处在十字路口，哪条路都不易行。只是，至少，我们不能让一个如此不公平的方案就此通过而不发出任何声音、不做出任何反抗。遂公民抗命。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吴明益：给我暴民学生们的一封信

“

我希望等到你们年华老去，请记得以同样的宽容、鼓励，与对等讨论的心态，对待你们的下一代，不要变成一个轻易说他人是‘暴民’，拒绝倾听与丧失行动力的大人。

”



吴明益，台湾东华大学华文系教授，作家。

我第一次认识暴民这个词，应该是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发生了美丽岛事件，施明德在第一波的搜捕中逃脱。当时刚学会翻报纸的我问母亲为什么要抓这个人？他们不愿意回答我。我听电视讲施一干人是“暴力分子”，后来施明德落网了，那张纱布包着下巴的照片果然看起来就像江洋大盗。我当时没想过，那是因为我脑中的形象语言，已经被电视“塑型”了。

第二次在报纸上看到暴民这个词是在我高中的时候，520 农民大游行。彼时没有网路没有三台以外的新闻，我的学校外，济南路从下午开始就塞满不可思议的人潮。下课后我没有直接回家，徘徊在立法院、新公园，我目睹数名警察把人拖到巷子里围殴，那一幕震撼我至今。隔天报纸全面性地说那是一群暴民，而不是一群农民。我开始对自己盲目信任媒体的信念感到动摇。

第三次是我大学时在诚品的地下室看了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纪录片影展，其中一部反中油后劲污染的影片，当地居民取水沟的水竟能用火柴点燃。我至今仍记得居民对采访者说：如果你住这种地方你要做暴民否？

这么多年来，不是从服贸议题开始，土地被剥削、农民被剥削、弱势群体被剥削时，都有很多人被迫当“暴民”。暴民不是一种身份，是一种阶级。剥削者不会成为暴民。

而此刻，你要做“暴民”否？



昨天我上完课后，午夜前回到台北，随即到现场。试着一遍一遍地走、观看，让心底的一些疑问撞击，直到天光。我得承认对这个议题的理解不够，但以阅读与观看，在这个夜晚，我试着为我的学生们绘制一幅思考地图。因为，做为一个被害者跟抗议者，得要准备的工作不同。抗议者往往比宰制者受到更多思维与行为上的挑战。

正如你现在已经知道的，“两岸服务贸易协定”是“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的一环。ECFA 的架构你可以轻易在网路上找到不同的评价。往根追索，马英九主政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架构？合理推测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兴起有关系。中国经济体的神话近年来已成国际话题，它究竟是实话还是谎言？你可以顺着这个问题，找到一系列的著作与文章阅读。

回到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的身上。服贸是 ECFA 的“早期收获清单”(EarlyHarvest)之一，什么是早收清单呢？以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ement）模式签订 ECFA 这类“双边免关税协定”，会有在一定年限内逐渐消除双方关税的规则。所谓“早收清单”就是“即时降税清单”，或者是“第一波降税清单”。顺着这个议题，我建议你还能去了解 WTO 这个组织的意义，以及它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当然，你务必得再去理解“反 WTO”阵营的理由。有些人认为，WTO 是强国在经济上剥削第三世界的手段，说不定是你会因此从根厌弃唯有完全的自由市场，才是挽救台湾经济唯一路向的说法。你可以去思考“自由经济”与 ECFA 之间的差异性，并且将其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经验之上：中国之于台湾，跟其他的国际贸易关系是否等同？与中国的贸易协定，能够单纯用经济的角度思维吗？

是的，你一定得涉及政治。因为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太复杂了。倾中情怀的政党，会说服你接受某些政策，反之则要你反对所有政策。民主政治是人类文化史上很年轻的制度，多数时候人们遵循的部落政治、宗教政治、皇室政治、独裁政治……，但民主政治也是相对缺点较少的政治制度。我认为政治学也是人类学、文化的一部分，从内政上来看，我们可以从议会政治的角度思考台湾的政党为什么无力为民众的权益把关，可以思考台湾未来产业结构的布局，当然也可以检视人性。你也可以更深入讨论具争议性的议题，你心目中或想要的台湾的政治定位是什么？

而当你的理念在代议会里处于弱势，却很可能是较前卫、较正确的观点时，除了固定的选举时间以外，要如何运用力量，让这个理念有重新被审视、注目的机会？这是为什么弱势团体权益受损时，常被逼着走上街头，以取得议题被关注的原因。



民主政治的基础是法治，从法律思维的路向往前走，ECFA 或服贸协议的法律位阶究竟为何？它在签订之前需不需要先被广泛讨论？进入国会后，它应不应该被实质逐条审查？它适用于国际法吗？

只是非法律人的我还是要提醒你，法律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圣经，法律往往也会是有权势者操弄的刀斧，这也是你得要学习理解、警觉的部分。

媒体处理这事件的态度，也会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深度。也许你认为，台湾的媒体被诟病已久，不少媒体人对议题的素养，早已不如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但媒体绝对是可以实践改革的管道，也是一个民主社会中最重要的神经。无论你做何种行动，都会警觉到媒体随时在侧。这次反服贸黑箱的学生与群众，为什么发展出所谓“有秩序、理性”的非暴力抗议，很显然跟媒体全面监控的新时代有关。我们知道媒体会拍摄，所以行为上也会有新架构，因为行动者心中隐隐也想透过媒体影响另一群人。

透过媒体，抗议者也得思考，“暴力”是由谁定义的？正如我上头举的后劲居民的例子，当你的家庭住在一个连水沟水都会着火的地方，并且完全被漠视，暴力反抗以求被关注，难道不是被暴力对待者最无奈、悲哀的反映吗？

最后你可以回到自身的生活，用你敏锐的直觉、思考去理解生活，从而保持对这些议题的敏感度。让我举几个例子，来思考两岸交流后，我们生活渐渐改变的微小状况。

我有一半的生活时间在以观光业、农业为主的花莲，自从陆客开放观光后，花莲的观光业正在产生质变。首先，几乎在每家饭店的旁边，都开设了贩卖红珊瑚、玉石的商店。红珊瑚是海域的珍贵生态，早年曾被滥采，后来逐渐萎缩。至 2008 年止，仅剩两台渔船领有采集红珊瑚的证件。没想到渔业署在当年又开放了六十艘。原本渔业署说明会逐年管制递减，今年渔业署再次公告修正“渔船兼营珊瑚渔业管理办法”，未来能采集红珊瑚的渔船，不但可以继承，并在血亲、配偶间移转权利，毁损还可再造建新船；同时，捕获量从三公吨增加到六公吨，容许的作业面积也增加了。我认为，这是肇因于陆客太爱购买红珊瑚的缘故，他们用金钱，打开了我们的法令。

而更令人感伤的是，为了吸引陆客进店，花莲街上的宝石店常见张贴着胡锦涛、习近平的立像。如果你此刻搭车到花莲，你还会在火车站的立柱上看到简体字、中国式句法：“花莲水平最高的酒店”。对于一个有敌意的政治体，为了赚钱而将对方的领导人立像摆在门口，蔚为城市景观，你认为这是一件美好的事吗？

再举一个例子，众所周知，任何文字出版进入中国都得经过“审查”。我曾替妮可•克劳斯(NicoleKrauss)的《大宅》撰写过中文版的序文，到中国出版时，序文里一句“参加农民



反圈地活动的空档”硬是被挑了出来，询问是否能够“删除”？一回与诗人陈黎聊天，他说他翻译的辛波丝卡诗选，在中国出版被修改了多处。我们签订协议的对象，不是纽西兰、不是日本、不是丹麦，而是这样一个言论设限，榨取式制度的国家。

有些人认为开放竞争是好事，赚钱是好事，但面对中国这个强势、复杂、诡谲的竞争者与消费者，我们很可能赔上的是长期经济健康、生态环境与尊严。谨慎对我们来说不是坏事。

在我片面的观察里，我想说的是，并不是你得具备上述眼光或知识才能参与抗争，而是在抗争过程里，你得试着去接受这些多元资讯，在迷惘中做出一时的决定。但请保持怀疑，保持接受新看法的情绪，有时也要挑战自己。我对你们在服贸这个议题上的关心与付出感到佩服，但台湾做为一个对内的宰制型社会、对外失去国际发声权的国家已久，我多么希望你们也能在更多被边缘化的议题上，勇于做“暴民”。当然，如我上面所述，是有思考力、有选择性、有行动力的“暴民”。请记得，当你们做这样的决定时，受到各种的抗力与诬蔑，也绝不会少。

过去的年轻人运动，很多人在时势改变后，成为这个宰制体制的参与者、掌权者。你们此刻的朋友里，可能有一些人也会，这是必然的事。那些不知为何说你们很棒的声音跟说你们是暴民的声音一样可怕。我希望等到你们年华老去，请记得以同样的宽容、鼓励，与对等讨论的心态，对待你们的下一代，不要变成一个轻易说他人是“暴民”，拒绝倾听与丧失行动力的大人。

这段时间，如果你们要留在台北，请寄封电子邮件给我，如果能写信告诉我你此刻的心情与心得，那就太好了。我也会不定时到现场了解状况，如果碰到，让我们点个头就好。国家陷入这样的状况，领导者让人失望至此，这不是值得击掌开心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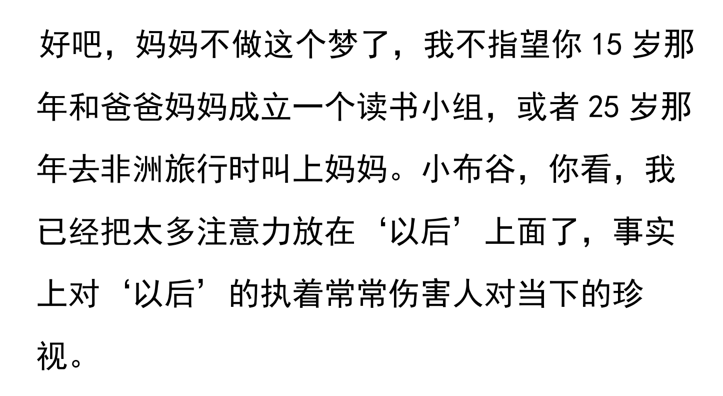
我们以哀悼者的心情参与，以挖矿工的态度开采自己的心灵，以候鸟的意志坚持下去。这是我今天写给你们的信。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诉⊣

刘瑜：给女儿的信：愿你慢慢长大



“

好吧，妈妈不做这个梦了，我不指望你 15 岁那年和爸爸妈妈成立一个读书小组，或者 25 岁那年去非洲旅行时叫上妈妈。小布谷，你看，我已经把太多注意力放在‘以后’上面了，事实上对‘以后’的执着常常伤害人对当下的珍视。

”



刘瑜，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清华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亲爱的小布谷：

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好是你满百天的日子。

当我写下“百天”这个字眼的时候，着实被它吓了一跳——一个人竟然可以这样小，小到以天计。在过去 100 天里，你像个小魔术师一样，每天变出一堆糖果给爸爸妈妈吃。如果没有你，这 100 天，就会像它之前的 100 天，以及它之后的 100 天一样，陷入混沌的时间之流，绵绵不绝而不知所终。

就在几天前，妈妈和一个阿姨聊天，她问我：为什么你决定要孩子？我用了一个很常见也很偷懒的回答：为了让人生更完整。她反问：这岂不是很自私？用别人的生命来使你的生命更“完整”？是啊，我想她是对的。但我想不出一个不自私的生孩子的理由。古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自私吗？现代人说：“我喜欢小孩”，不自私吗？生物学家说“为了人类的繁衍”，哎呀，听上去多么神圣，但也不过是将一个人的自私替换成了一个物种甚至一群基因的自私而已。对了，有个叫道金斯的英国老头写过一本书叫《自私的基



因》，你长大了一定要找来这本书读读，你还可以找来他的其他书读读，妈妈希望你以后是个爱科学的孩子，当然妈妈也希望你在爱科学的同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式挣脱虚无。

因为生孩子是件很“自私”的事情，所以母亲节那天，看到铺天盖地“感谢母亲”、“伟大的母爱”之类的口号时，我只觉得不安甚至难堪。我一直有个不太正确的看法：母亲对孩子的爱，不过是她为生孩子这个选择承担后果而已，谈不上什么“伟大”。以前我不是母亲的时候不敢说这话，现在终于可以坦然说出来了。甚至，我想，应该被感谢的是孩子，是他们让父母的生命“更完整”，让他们的虚空有所寄托，让他们体验到生命层层开放的神秘与欣喜，最重要的是，让他们体验到尽情地爱——那是一种自由，不是吗？能够放下所有戒备去信马由缰地爱，那简直是最大的自由。作为母亲，我感谢你给我这种自由。

也因为生孩子是件自私的事情，我不敢对你的未来有什么“寄望”。没有几个汉语词汇比“望子成龙”更令我不安，事实上这四个字简直令我感到愤怒：有本事你自己“成龙”好了，为什么要望子成龙？如果汉语里有个成语叫“望爸成龙”或者“望妈成龙”，当父母的会不会觉得很无礼？所以，小布谷，等你长大，如果你想当一个华尔街的银行家，那就去努力吧，但如果你仅仅想当一个面包师，那也不错。如果你想从政，只要出于恰当的理由，妈妈一定支持，但如果你只想做个动物园饲养员，那也挺好。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你能幸运地找到自己的梦想——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人生的方向感，又恰好拥有与这个梦想相匹配的能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与其梦想成比例的能力。是的，我祈祷你能“成功”，但我所理解的成功，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敬畏与热情——在妈妈看来，一个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上班是个负担的律师，并不比一个骄傲地对顾客说“看，这个发型剪得漂亮吧”的理发师更加成功。

但是，对你的“成就”无所寄望并不等于对你的品格无所寄望。妈妈希望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白来一趟，能有愿望和能力领略它波光潋滟的好，并以自己的好来成全它的更好。妈妈相信人的本质是无穷绽放，人的尊严体现在向着真善美无尽奔跑，所以，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房子车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



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叠嶂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

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

有一次妈妈和朋友们聊天，我说希望以后“能和自己的孩子成为好朋友”，结果受到了朋友们的集体嘲笑。他们说，这事可没什么盼头，因为你不能预测你的孩子将长成什么样，一个喜欢读托尔斯泰的妈妈可能生出一个喜欢读《兵器知识》的小孩，一个茶党妈妈可能生出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小孩，一个热爱古典音乐的妈妈可能生出一个热爱摇滚的小孩，甚至，一个什么都喜欢的妈妈可能生出一个什么都不喜欢的小孩？而就算他价值观念兴趣爱好都和你相近，他也宁愿和他的同龄人交流而不是你。所以，朋友们告诫我，还是别做梦有一天和你的孩子成为朋友啦。

好吧，妈妈不做这个梦了，我不指望你 15 岁那年和爸爸妈妈成立一个读书小组，或者 25 岁那年去非洲旅行时叫上妈妈。如果有一天你发展出一个与妈妈截然不同的自我，我希望能为你的独立而高兴。如果你宁愿跟你那个满脸青春痘的胖姑娘同桌而不是妈妈交流人生，那么我会为你的人缘而高兴。如果——那简直是一定的——我们为“中国往何处去”以及“今晚该吃什么”吵得不可开交，如果——那也是极有可能的——你也像妈妈一样脾气火爆，我也希望你愤然离家出走的时候记得带上手机、钥匙和钱包。

小布谷，你看，我已经把太多注意力放在“以后”上面了，事实上对“以后”的执着常常伤害人对当下的珍视。怀孕的时候，妈妈天天盼着你能健康出生，你健康出生以后，妈妈又盼着你能尽快满月，满月之后盼百天，百天之后盼周岁？也许妈妈应该把目光从未来拉回到现在，对，现在。现在的你，有一百个烦人的理由，你有时候因为吃不够哭，有时候又因为厌奶哭，你半夜总醒，醒了又不肯睡，你常常肠绞痛，肠绞痛刚有好转就又开始发低烧，发烧刚好又开始得湿疹？但就在筋疲力尽的妈妈开始考虑是把你卖给马戏团还是把你扔进垃圾桶时，你却靠在妈妈怀里突然憨憨地一笑，小眼睛眯眯着，小肉堆堆着，就这一笑，又足以让妈妈升起“累死算了”的豪情。

岂止你的笑，你睡着时嘴巴像小鱼一样嘬嘬嘬的样子，你咿咿呀呀时耸耸着的鼻子，你消失在层层下巴之后的脖子，你边吃奶边哭时的“哎呀哎呀”声，你可以数得出根数却被妈妈称为浓密的睫毛都给妈妈带来那么多惊喜。妈妈以前不知道人会抬头这事也会让人喜悦，手有五个手指头这事也会让人振奋，一个人嘴里吐出一个“哦”字也值得奔走相告——但是你牵着妈妈的手，引领妈妈穿过存在的虚空，重新发现生命的奇迹。现在，妈妈在



这个奇迹的万丈光芒中呆若木鸡，妈妈唯愿你能对她始终保持耐心，无论阴晴圆缺，无论世事变迁，都不松开那只牵引她的手。

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

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

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赵越胜：圣殿在静穆中屹立

“

听众听到晓玫演奏的巴赫会掉泪，因为晓玫的巴赫曾在苦难中浸泡，曾珍藏于渴慕着的心灵，曾在没有时间的黑洞中等待着天地诞生的刹那。在西方钢琴家随便给你一首三度卡农的地方，晓玫却让你体会一肩凉雾，满耳秋声。

”



赵越胜：人文学者，现居法国。“赵越胜沙龙”创建人。

【上】

建英：

晓玫在香榭丽舍剧院开音乐会了，这是我们一直期盼的。这些年来，我们眼见她在寂寞中持守自己的音乐理念和演奏风格，欣慰之余，便是思索。就像我们常说的，晓玫的演奏太值得一论。

我们早早赶到剧院，天阴阴的，傍晚几丝春雨飘飘，街旁残樱乱落，带着巴黎暮春的忧郁。时间还早，剧院门口却已人头攒动。今晚晓玫的曲目极单纯，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节目单上简简单单印了这么一行，也无中场休息，一气弹全场。从前来听齐默尔曼和索科洛夫的音乐会，曲目都是满满对折两页，从巴赫到拉威尔，跨度极大。而晓玫的音乐会曲目简单到近乎苛刻，她凭什么吸引观众？我站在门厅打量听众，从十岁左右的孩子到坐轮椅的老人，从身着晚装的淑女到穿牛仔运动鞋的青年，各色人等齐全。一位妇人气喘吁吁地赶到售票处问票，票房小姐说已全满，让她等开场前的退票。看她失望又焦虑的样子，我对 Sherry 说，晓玫的“粉丝”真有“死忠”的。

香榭丽舍剧院是巴黎的头牌剧院。剧院每年寄来全年档期安排，念念演出者的名单，真是群星灿烂。这座剧院在世界音乐史上也是举足轻重。一九一三年五月三十日，佳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就在这里首演《春祭》。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惊世骇俗，更有半裸的尼金斯基激情四射的天神之舞。那时巴黎还消受不了这种新潮玩意儿，结果这座高雅的剧院成



了角斗场。乱阵中，悄悄坐着一位奇女子——可可•香奈儿，她刚在康朋街开了时装店，不用多久，世界上的时髦女士就要跟着她的裁剪刀转。更妙的是，十年之后，她资助了《春祭》的复演，并成了斯特拉文斯基的情人。

进剧场坐好，抬头看纳比派巨擘莫里斯•德尼手绘的天顶，光彩斑斓，透着几分异国情调，想一会儿有位东方女子要在此一展琴艺，觉得很合调。剧院三层楼，近二千座，竟是座无虚席。只为这场总长不过一个小时的《哥德堡变奏曲》音乐会，晓玫的号召力真惊人。灯光渐暗，剧场嘈杂的人声随之渐弱，瞬间便是一片寂静。台上一架斯坦威，台后一帘深棕色幕布，柔暗的灯光洒在黑白键上，舞台活脱德拉图尔画作的色调。人们屏息等待，时间仿佛凝滞。突然，晓玫静悄悄出现在舞台上。她穿的仍是那件深咖啡色中式丝质长衫。以前和她说过几次，让她置几件上台的行头，但挑来挑去最后还是这件。后来才明白，她着装有音乐上的考虑。人家女演奏家上台，谁个不袒胸露背，光彩夺目？唯独晓玫，演出服不仅款式简单，连色彩也选暗调子。她觉得，演奏者不要用外在的东西干扰听众。用她的话说，是“人要藏在音乐背后”。她一贯以为，演奏者不是主角，只是一个传递音乐的使者。明白她的意思后，我调侃她:“敢情您这大褂是上台战斗的迷彩服啊。”她大笑说:“就是这意思。”此时，掌声骤起，依稀听到有人呼喊。晓玫落座，低头凝思，其实不过片刻，我却觉好长。待她手落声扬，那主题咏叹便飘然而至。

一九九九年，Harmonia Mundi 唱片公司发行了晓玫的《哥德堡变奏曲》音碟，被各古典音乐杂志评为震惊(Shock)，五音叉(Diapason 5)，超强(ffff)，十几年常卖不衰。美国巴洛克音乐专家布雷德利•雷曼(Bradley Lehman)将这张碟和古尔德一九五九年的演奏录音称为“并峙的双峰”。雷曼先生曾在牛津大学《早期音乐》杂志上撰写专论“巴赫羽管键琴、管风琴、古钢琴中的律学”，自己亦是羽管键琴演奏家。他对晓玫的演奏有许多精辟的评论，待我慢慢说给你听。

多年听晓玫的录音，对她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但今晚，琴声一起，我就感觉到变化。十年后的晓玫，烟火气全消，似是焚香顶礼而来。指下音乐如出自幽林老泉，一粒粒晶莹的水珠淌过键盘，呼吸分句沉着从容，织体表达疏朗有致。要找个色彩来形容晓玫指触音色，我取“青翠欲滴”。法国《费加罗报》著名乐评人波蒂(Petit)曾评价晓玫的音色“fragile”，倒与此意暗合。

巴赫称自己这部作品是“由各种变奏组成的抒情曲”。主题咏叹的旋律极优美抒情，其中蕴藏着由随后三十首变奏倾诉的情感。“咏叹”首先是歌唱用语，这部变奏的首要特征就是“歌唱性”。其实又何止这部变奏曲，巴赫的音乐本来就立基于他的众赞歌上。歌唱是巴赫音乐的灵魂。这并不奇怪，路德搅得欧洲翻天覆地之后，竟以创作圣咏为精神归宿，



体悟出“为了领会灵奥的世界，耳朵胜过眼睛”。巴赫是位虔敬的路德教信徒，他浸淫在这一传统中。这位朴实笃信的人，把自己内心的虔敬化作朴素又炙热的歌咏。他的精神活动需要内心的歌唱。那些创作手法，赋格、主题扩展、倒影进入……不过是为了展现“宇宙之和声”（开普勒语）。所以它要求演奏者心怀敬畏，在心里和指下歌唱。

晓玫对此心领神会。听她诠释的主题咏叹，你会惊讶巴赫的抒情开始得如此典雅。相比之下，连古典时期的维也纳风格都略显卖弄风情。这是自内心唱出的典雅，深情又矜持。三分多钟的演奏，晓玫始终保持气脉的贯穿，分句恰如歌唱换气的“气口儿”，复调展示峰回路转。各声部的旋律线清晰分明，又和谐融洽，细腻的指触做出微妙的力度变化，调整着音色的明暗对比。相比浪漫主义的绚丽色彩，巴赫的音乐更像黑白照片，仔细体会能见出灰黑层次的深入浅出，虽不眩目，却经琢磨。晓玫展示给我们的，正是一幅层次丰富的黑白照片，留给我们无穷的想象空间。

当代演奏名家，无人不弹巴赫，但经得住考验的演奏并不多。原因之一恐怕是这些大家在演奏巴赫时，太多的表现了自己。他们技艺高超，自我超强，自觉不自觉地就把老巴赫撂在一边，自说自话起来。他们什么都有，唯欠一点敬畏心。伟大的尤金娜弹奏的巴赫就是显例。其节奏之飘忽，分句之任意，速度之随便，整体结构之无章法，简直让人不忍卒听。涅高兹说她“有些任性”，实在是太客气。她岂止“任性”，简直就是恣意妄为。当然，这个批评并不稍减我对她的敬意。一个敢对暴君说“不”的人，该有多强大的精神力量。超常的坚韧难免伤及均衡，而诠释巴赫却需有强大的平衡感。结果，性格强，却可能成了弹好巴赫的障碍。

再看被雷曼博士誉为“双峰”的两个演奏，古尔德一九五九年和晓玫一九九九年的《哥德堡变奏曲》录音。古尔德的演奏汪洋恣肆，但不出大格。各变奏的处理匠心独具，整体上却均衡完整。主题咏叹中的那些装饰音急促轻灵，乍一听，不是巴赫的味道。但设想在巴赫时代的羽管键琴上弹奏这些装饰音，其效果很可能如此，便知古尔德的诠释虽显突兀，却有道理，有放纵，亦能控制。虽是“六经注我”的弹法，但“经”还在，只是句读、考订有别。晓玫的演奏却是另一番景象。她仔细考量每一变奏的结构和句法安排，特别是那些“内分句”(inter-phrases)，清晰谨严，处理装饰音的手法也有说服力。像主题咏叹第十、十一小节左右手呼应的波音，做得有种说不出的圆润典雅，极打动人。她是“我注六经”的弹法，不求新奇怪异，只求自然会意。

在巴赫的音乐殿堂里，古尔德是排闼直入，坐下便弹，每有兴会，便手舞足蹈，就算老巴赫在旁也徒呼奈何，只能认这孩子天纵英才，即使骄纵亦由他去。晓玫却是三叩华门，袅袅升堂，焚香净手，澄心滤意，在珠帘四下的雍容静谧中唱给老巴赫听。老人家会心地微



笑，带着慈爱与赞赏。我以为，古尔德弹得辉煌，晓玫却弹得庄严。古尔德的巴赫是“他中之我”，晓玫的巴赫是“我中之他”。古尔德天马行空，晓玫却执著地站在地上。古尔德和大师时有争执，晓玫却只向大师致敬。古尔德对自己的冒犯往往满不在乎，晓玫却时常谦逊地心存犹疑。

收束我奔逸的思绪，回到音乐厅里吧。

第三变奏在我心目中，是巴赫音乐建筑美的象征。从谱面上看，第二、三行低音谱表似用音符画出“檐牙高啄”。在录圖音中，晓玫弹了一分二十二秒。今圖晚她弹得稍慢，显得更从容自圖由。右手 non legato 与左手 stacato 配合得天衣无缝。断奏如飞石落键，每击力道饱满又清晰区分出轻重层次，声音通透，弹圖性十足。古尔德弹得琴键火星四溅之处，在晓玫手下却如汩圖汩山泉，欢快地流淌。古尔德手舞足蹈之处，晓玫却身形稳定，无任何多余的肢圖体动作。力量皆自内而发，手在键上动作极小，似与琴键连为一体，真如约瑟夫•迦特所言，琴键成了手臂的延伸。乐曲几经折冲回还，戛然而止在符点四分 B 音上，一座坚圖实恢宏的建筑霍然眼前。晓玫却并不收束，依然静圖坐，似演奏仍在继续。听众也在等待，瞬间静极，落针可闻。巴赫在终止处指示了一个自圖由休止，不在音符而在小节线上，似乎给你打开一扇门，要你进去看看，里面还有什么珍宝。一切都妥帖、自然、均衡、理智。这种风格难道能用“巴洛克”这个名称一网打尽？它同贝尼尼的圣特蕾莎祭坛的迷狂，同维尔茨堡主圖教圖堂的奢华，同鲁本斯画作中的肉圖欲横飞竟归同一名下？

那天电话中曾和你谈起过这个问题，借这封信再多说几句。布克哈特用这个词的本意是概括文艺复兴后期意大利绘画与建筑风格中的某些趋向。而后，艺术史家将此词推而广之，用来标识一六〇〇年以来近二百年欧洲各种艺术形式的风格。这带来了时期划分上的方便，也带来具体艺术鉴赏活动的混乱。“巴洛克”一词，究其本意，是夸张、怪诞、奇异，是不均衡、重琐碎、尚极端。用这样一个标志某种特殊艺术风格的词，来概括一个漫长时期的艺术精神，这有陷我们于空疏的危险。我宁愿避开这个词，从整个艺术史的角度体会每一艺术家的风格气质和精神归属。以巴赫为例，除了时代的吻合，其音乐的精神气质和“巴洛克”一词的所指很少相似。沃尔夫林曾就艺术的风格给出两组原则。其一，古典/文艺复兴，其特质为清晰、冷静、可控性、理智标准、和谐与平衡，其二，巴洛克/文艺复兴，其特质为明暗对比、戏剧化、运动感、色彩与激情。论及巴赫的音乐特质，显然更近前者。此外，巴洛克风格的兴起，是对宗教改革的反动，我们在研读巴赫音乐时不可不察它与路德新教的关系。



我更相信巴赫的音乐气质天生就是温克尔曼所定义的“古典”：“表现平静，但打动人，表现静穆，却不冷漠。”即使是那些极抒情的段落，亦有一种“高贵的单纯”和“肃穆的伟大”。我甚至猜想，假如巴赫以《拉奥孔》为题材谱一部清唱剧，一定会同那座希腊雕像一样，“痛苦却不哀号”。亨利•朗似乎也有此困惑。他以区分早、晚期巴洛克来摆脱这个矛盾，称巴赫时代的晚期巴洛克为“古典风格巴洛克”。其实，这是学问家作茧自缚，巴赫的广博深奥岂是一个概念所能尽括。论及巴赫，其质也诚，其器也广，其魄也雄，其情也柔，这“诚广雄柔”解说不尽，非在凝神聆听中体会不可。

谈及这些涉及艺术风格定性的话题，意在展开“深度诠释”的视野，把握更丰富的思考背景。图里克在讲述巴赫音乐的演奏原则时指出，如今的钢琴演奏者接受的大多是十九世纪以来钢琴技法的训练，是以现代钢琴的技术要求来“反弹”巴赫，但“巴赫的音乐是从一种非常不同的形式感和结构感中成长起来的”。她还说：“幼年时期训练而形成的下意识思维习惯会自然在演奏中表露出来。”听阿格里奇演奏的巴赫，便知她说的极有道理。要体会巴赫的风格，接近“本真”地演奏他的作品，倒真需要离现代钢琴演奏的“范儿”远一点。收束浪漫主义喜爱的个性张扬，以敬畏心去眺望远天。与其不知轻重地“自创一格”，不如深思熟虑地“循规蹈矩”，取法乎上，仅得其中亦不远矣。

晓玫停顿片刻，微微抬头上视，能见出额上薄汗。后来她对我说，现场演奏的好处是能自由调整每一变奏的间歇时间，把停顿也化为音乐的一部分。而在录音棚里，间歇时间都由录音师掌控，切得整齐划一。所以听录音总感觉有点呆板。在音乐会上，一个变奏结束，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感觉，等到灵光来临的一刹那再下键。我想那天她在台上的等待就是为此。突然，第七变奏绝壁悬瀑般直泻而下，激流翻卷，飞沫掠岸。迅疾之下，却见出分句的妙处，快速跑动中同样有色彩光线的微妙变化和清晰的乐句轮廓。高手操琴，越在织体繁密处越能听出峰回路转的空间。这是极高的演奏要求，不下苦功断不能到此境。细听晓玫的指触，竟漾着几分古意，那些勾抹击弹的功夫早已化为无形。由于对位的精巧，巴赫的句法有时同旋律线并不一致，巴赫难弹也在此。你不能像演奏肖邦那样，凭追随旋律的起始而自然分句。同样是密集音群的快速跑动，巴赫与李斯特的韵味完全不同。我那天在布鲁塞尔乐器博物馆，看羽管键琴、楔槌键琴和现代钢琴不同的机械构造，似乎对巴赫使用的键盘音响有所领悟。我猜想巴赫的键盘乐作品大部分是为双键盘羽管键琴所做，而羽管拨动琴弦的感觉不同于琴槌击弦，所以它的快速跑动的效果一定更近于嵇康所言：“轻行浮弹，疾而不速，留而不滞，翩绵飘邈，微音迅逝。”

几年前，晓玫接受法国《钢琴》杂志采访时，开玩笑说，她觉得巴赫的音乐与佛相通。我对此万不敢从，曾力驳其谬。后来再想，晓玫也有她的道理。她沉浸于巴赫音乐，感受其



深邃正大，亦是感受“正观之心，湛然清净”的境界，在巴赫音乐自身的崇高感中，体悟“法相庄严”。这与康德的头顶星空，岂非异曲而同工？怀有宗教感的虔敬之心，会超出个人遭际而开敞慈爱的胸怀。在巴赫，这慈爱的胸怀表现为他的音乐，这音乐亦有“普度众生”的大慈悲。我以为，在《哥德堡变奏曲》中，这悲天悯人的情怀集中体现在第二十一变奏这支七度卡农之中。

晓玫抬起手，又深深吸气，然后下键。指下飘出轻柔的声音，像一支弱起的咏叹，辗转低回，几分仰望，几分祈求，以完美的 legato 奏出婉挚的长乐句，飘飘摇摇。弱音如低首默祷，随后，适度渐强，似暗夜将退的天穹，残星闪烁，远山晨曦却已缓缓升起。如此深静内敛的诠释，靠内分句的曲纡起伏，编织着经纬分明的壁挂，仿佛勾勒着巴赫心中人子的圣容。这表达尊崇的音乐，无危苦之声，却有大哀之情，然大哀无怨有爱，巴赫倾泻出的人神之爱若汪洋大海。主题几次卡农式进入处理得精致妥帖，似要唤你跟上咏唱：“你降自苍穹/来抚慰人间的忧伤与创痛。”（歌德）一个诚挚、虔敬又高贵的演奏。郎吉努斯曾说：“崇高并不是激情而是伟大心灵的回声，人们赞赏崇高，而它往往朴实无华，引起我们对世间伟大事物的渴望，这才带来崇高感。”这正是晓玫对崇高的领会。她最欣赏卡萨尔斯的话，巴赫是把神圣和平凡完美结合的典范。她总强调“要让巴赫说话，而不是由我来替他说话”。她谦恭地仰望伟大，又把伟人当做自己心灵的朋友，与他们平等对话。她传递给我们源自巴赫音乐的崇高感。她在巨人庇护下，耕耘自己的心田。

还记得巴赫那张亡妻后的画像吗？一七二〇年，巴赫短期外出，归家时爱妻芭芭拉已经去世，天人永隔竟在转瞬之间。或许是“望庐思其人”，画像上的巴赫一脸愁容，满眼哀伤，似泪水满盈。这条硬汉，能拔剑与人格斗于暗巷，亦能一腔浪漫柔情。贝多芬说他是大海，还有什么比大海更能接纳一切希冀与绝望，收获与丧失？在这部展示巴赫心中一切欢乐与创痛的变奏曲中，第二十五变奏最体现巴赫的绕指柔肠。我曾私下称之为“恋人絮语”，不敢唐突大师，实在是闻其声而心所至。今晚晓玫真弹得让人心碎。

第一小节右手奏出的音声深婉摇曳，竟然带出舒伯特的味道，是 G.莫尔为费舍•迪斯考伴奏 Lieder 时的断肠之声，是《水上吟》、《菩提树》忧伤的前奏。低音区若隐若现的三连音不正是肖邦降 D 大调前奏曲中滴落屋檐的雨声吗？涅高兹说，他每次弹肖邦都会想起巴赫，说肖邦根本就是个古典主义音乐家。至少我们可以断定，肖邦每日以巴赫为功课绝非徒费时光。这旋律忧伤凄美，在不同声部间交织缠绵，似诉不尽的柔情。第八节是谁欲言又止？右手两拍休止却换来左手无奈的推脱。十二节右手三十二分音符的急切是恋人的挽留，还是分手的绝决？晓玫指触的柔和细腻营造出氛围蕴藉，似勾描着红烛明灭，罗帷掩映中的慵懒。弱奏进入的反复，仍是絮语喁喁，左手不断的固定音型像极催人更漏。无奈



一庭愁雨，半树梨花，断肠人终赴天涯。突然的宁静，一个延长的休止，跟着，以极弱奏处理主题倒影进入，似是最后的叮咛，凄清柔婉竟直逼美成名咏“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晓玫的演奏激起我诗意的联想，你大概会说我“恶习不改”。这是我们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讨论的问题。这个题目要说的话还很多，信已太长，下封信我再给你讲我的道理。

【下】

建英：

还记得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研读汉斯利克的《论音乐的美》吗？你颇喜他的形式主义立场，我却坚信作曲家的活动必再现某些“内容”。我对汉斯利克有种出自本能的反感，因为他要把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活生生从我们怀里夺走，关入冰冷的理论牢笼。你反对“描述”音乐，可有什么办法？只要想表达我们听音乐的感受，就非“说”不可。而一切“说”都是用“词儿”来“说”，一切“话”都是用“字眼儿”组成的“话”。正像一切文学（Literature）都来自文字（letter）。

二〇〇七年夏，我自第纳尔乘船往圣马洛。船行海上，见水天空明，海鸥环翔，波浪轻柔，落霞满天。海天的瑰丽引我有心试着组织句子。正搜肠刮肚找词儿，《平均律》中的 C 大调前奏曲突然鸣响耳畔。声音真切，如从胸中涌出。刚刚组成的句子便音韵铿锵地散落在乐句行进间，这支前奏曲正是眼前景致的最好描述。不是我们想用文字解说音乐，是音乐带着文字撞进我们怀中。深解巴赫的施韦泽便是从音乐诗学的角度阐释巴赫的音乐。他用法文写就的《巴赫传》第一版，副题就是“诗人音乐家”。他把巴赫看做一位用音符做诗的诗人。其实若要从哲学角度思考音乐，最聪明的办法是避开本体论而从语言入手。维特根斯坦对音乐的思考比汉斯利克更深入，这恐怕是原因之一。

你知道，《哥德堡变奏曲》是卡农手法的经典。卡农这个源自希腊的字，其本意就是“规则”。它以声部模仿为特征，依循严格的规则，表达丰富的乐思，是名副其实的“戴着镣铐跳舞”。以这种方式作曲，像我们先人依声律作诗填词。声韵有宽窄，格律有平仄，词牌有长短，但这些规则在诗人手中千变万化，表现无限丰富的人类情感。以严苛拘束的形式，表达自由无涯的想象，是诗人所为。同是五言律，可闲逸如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可悲凉如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同是《贺新郎》，在辛稼轩笔下，能描摹“风前月下，水边幽影”的凄凉，也能长啸“看试手，补天裂”的豪放。巴赫



一部《哥德堡变奏曲》，以卡农手法写尽人间悲欢离合，其丰满卓绝，化卡农的严格规则为扶摇九天的巨翼。

音乐会结束了，观众起立鼓掌十几分钟，晓玫无奈又回到台上加奏了两首小曲。晓玫退场后，激动的观众仍不肯散，聚在大厅等晓玫签名。长长的队伍绕大厅好几圈。我们稍等片刻，想晓玫一时半会儿抽不得身，便先走了。后来得知那晚签完名已十一点多钟，晓玫去音乐厅旁的餐厅吃饭，结果餐馆中多是音乐会的听众，见晓玫进来，又全体起立鼓掌致意，良久不歇。

我前面对你说过雷曼先生极推崇晓玫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他有一段极妙的比喻来比较佩雷亚和晓玫演奏的区别。他说：

你在一座城市中，懒散而舒适地靠在沙发上。世界坚实而牢靠，《哥德堡变奏曲》开始了……音乐美妙地进行。当下此时的体验是美妙的……在此寂静的冥想中，你美妙地听了一遍《哥德堡变奏曲》，这是佩雷亚的演奏。

你乘一叶扁舟荡漾在宁静的波心。《哥德堡变奏曲》开始了……但你注意到这个过程中多了些什么……由于小船带动你的身体，随水波微微摇荡。你自身处在这个不断的运动中。你可以设想音乐在分分秒秒中变动不居，给你展示出《哥德堡变奏曲》中那些微妙变化之处，远胜于在坚实干燥的陆地上你所能想象的。作品自身揭示出比你所熟知的更多维度。它不仅仅是完美，它自身带有某些美的非理性。那起伏跌宕的瞬间正像你的小舟，飘荡在波浪之间，倾听者在运动中……你更能感受到超脱控制的自然之力的影响，你的倾听因此而更丰富。这是朱晓玫的演奏。

听佩雷亚演奏，时间感是凝固静止的。听朱晓玫演奏，时间感是流动的。听佩雷亚，如果你走了神儿，则一切仍会循规而行，等你回过神来，一切原封未动，你自己回到了原处。听朱晓玫，如果你片刻迷失，时间自己会轻轻摇醒你。这丝毫无关乎演奏中的节奏的起伏，倒毋宁说是由朱晓玫使听众感受时间的方式所至。

曾有听众对晓玫说，每次听你演奏，都让我落泪。是什么东西让一位东方女子演奏的西方古典引得西方听众落泪？非真情所至，不能让人魂销魄动。情由心生，而此“心”却是我们生死荣辱的家园，它是“经验”，历练，是历史，是“时间”。晓玫“迫使”西方观众感受到何种不同的“时间”？

人在历史中感受时间。而个体的历史不过是经历自己的生命。战后的西方人，在宁静和平的时间之流中，按部就班地出生、成长、求学、就业。所有的离乱和苦难在他们不过是传说中的历史。如果他们有才分成为一个音乐家，他们会拜师、考试、竞赛、演出，他们从



自己的文化背景上去感受音乐。他们习得的是文化中的音乐。在他们，时间是自然的流驶，是外在的生存框架。晓玫感受的时间却是困惑着圣•奥古斯丁的时间，它不是平静的时间之流，而是“由心灵去度量的时间”。这时间会弯曲、塞滞、回返。当晓玫硬把一架钢琴搬到农场，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后，稍抚几曲时，时间便化作灵肉的一部分，成为纯粹“内在”的。如果海德格尔所说“生存性的本来意义就是将来”真有道理，那么，晓玫在那一刻因没有将来而失去了生存性。但这只能是外在的生存性。因为她在悄悄地读巴赫，这不是为了将来，而只是为在自己的心灵中测度和体味生命。这时间是内在于她的，她经历着一个没有过去和将来的混沌的现在。但光却生自混沌。她偷赏吉光片羽，因时间不再流动而积蓄愈丰，沉淀愈厚。她说那时偷弹一首巴赫的小前奏曲“觉着美得心颤”。这可不是那优雅的济慈告诉我们的，“美即是真”，这美是难，直教人生死相许。

听众听到晓玫演奏的巴赫会掉泪，因为晓玫的巴赫曾在苦难中浸泡，曾珍藏于渴慕着的心灵，曾在没有时间的黑洞中等待着天地诞生的刹那。在西方钢琴家随便给你一首三度卡农的地方，晓玫却让你体会一肩凉雾，满耳秋声。眼下时有灌水“教授”教导我们那个时代的“美妙”，但愚钝的我们却在他们看到鲜花的地方只看到鲜血，所以死活不肯回到那地方去。尽管悲凉苦难能玉成我们的人格，我们却更喜春花烂漫处的园柳鸣禽。

以自己的心灵度量时间的晓玫，练得苦，思得深，在演艺界这个名利场中，她极低调，只固守自己的标准，那美的召唤，只建筑自己心中的圣殿。她几乎本能地拒斥一切市场化的操作，对许多让她扬名立万的机会说“不”。我有时会翻阅各种媒体乐评人对她的演出和录音的评语。一次见《法兰西学院评论》的乐评人说她的演奏是里帕蒂、哈丝姬尔一类钢琴家“神奇的再现”（Le miracle se reproduit）。我想这个评价够高，告诉她，晓玫或许会“得意”一下。打过电话去却被她硬生生一口顶回来，“他太夸张了”，语气有点恼火。我问，你是不是就怕人夸。她想想说，“有点儿”。前些年，法国最著名的文化节目主持人伯尔纳•毕沃，在他的节目中采访晓玫。采访结束时，他依照常例，问晓玫一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向上帝提一个要求，你会提什么？”晓玫冲口而出：“我要他介绍我认识巴赫。”全场观众绝倒。

晓玫住处在新桥桥头，出门左拐百米，就是艺术桥。桥上终日喧闹，常有“酷儿”即兴表演。摇滚、饶舌、街舞，各呈其能，围观者彩声不断。晓玫推开窗便市声震耳，关上窗烦嚣顿失，岑寂袭人。通常，晓玫独与巴赫对话，倒是一幅陶潜诗意：“斯晨斯夕，言息其庐，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晓玫不善饮，但巴赫赋格声起，自是春醪满堂。日复一日的练习，也够苦，会有烦躁不舒，肩酸手硬之时。晓玫会下楼，沿塞纳河左岸过艺术桥，进卢浮宫。她爱去北方画派馆，在丢勒、布鲁盖尔、维米尔的画作前静圝坐，沉浸在这些大



师画作单纯质朴的宁静中。她爱北方画派，因为巴赫是一直往北走，从阿恩斯塔特往吕贝克，步行近四百公里，为了听布克斯胡德演奏管风琴。在深秋的凄风苦雨中穿越哈尔茨山谷的巴赫，绝想不到三百多年后，有一位中国女子，会献身于他的音乐。

二〇〇五年，晓玫要去录《平均律键盘曲集》，这是她多年的心愿，她开玩笑说："录完《平均律》，可以去死了"，颇有"朝闻道，夕可死矣"的古人遗风。临行前她有点紧张，因为录音地点是徐亚英先生用明希家族的一座大谷仓改建而成的音乐厅。晓玫不熟悉它的音响效果，租来的琴也不顺手，但却语气低沉地说"反正拼了"，那坚韧果绝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味道。先录好第二册，听后她不满意。这很正常，晓玫对自己要求苛刻是一贯的，我几乎想不起来她对自己录制的哪张唱片比较满意。待听了样带，确实，最后几首赋格弹得不够从容，不是她的最好水平。她不说话，又投入第一册的准备，而这次录得极成功，总体把握游刃有余，人琴似乎融为一体。我个人以为是《平均律》最好的录音之一。待她录制的海顿问世，好评如潮。晓玫送给我们的片子，我没急着听，先寄给了你。待夜阑人静时，我到听音室独赏。以我阅片之多，如晓玫这样典雅、精巧、抒情的演奏，竟想不出有第二人。第三十八号 F 大调奏鸣曲的广板乐章美得让人心醉，那略带忧郁的深歌慢吟令我忆起维吉尔《牧歌》的诗行："啊，在什么辽远的将来才能回到故乡/再看见茅草堆在我村舍的屋顶上。"

我常想，吾辈何德何能，竟蒙上天垂爱，能在这个不太平的，甚或暗夜将临的时代一窥天光，听到竞马的歌唱，晓玫的琴声？恐怕老天就可怜我们这点"痴"。再想，竞马之歌唱，晓玫之弹琴岂不也痴？痴痴相遇亦是幸事。那位远在美国密歇根的雷曼先生曾为晓玫引用过詹姆斯•泰勒的诗："谁知我们如何攀至山顶/但只要我们攀登/便能享受旅途的迢遥。"我想他也是一"痴人"，而痴不就是因"知"而"病"吗？

几天以后，我们去给晓玫送新烤的面包。她喜欢，说比面包房烤的好。滨河大道无法停车，便坐在车中等她下楼。见她匆匆跑过来，宽袍飘飘，知她又在练琴。台下的晓玫素面朝天，憨憨笑着，温和的像邻家大姐。河风荏苒，吹乱她的短发，霞落晚树，映在她的肩头。她接过面包连声道谢，转身回返，不停回头招手，见她常年伏琴的腰背微曲，缓缓消失在人流中，心中漾上感动。正如巴赫的神圣不离俗常，美与高贵亦藏身于日常操持。生命中所求不多，但执著的那点儿东西却一定是至高的境界。卡夫卡对此亦悟得深："我们没有必要飞到太阳中心去，然而我们要在地球上爬着找到一块清洁的地方，有时阳光会照耀那块地方，我们便可得一丝温暖。"

巴赫埋骨于他服务多年的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没有雕琢的装饰，只一块黄铜牌平铺地上，注明他的生卒年月。你如不经意，会踩着它走过去。巴赫的胸像安置在瓦尔哈拉圣



殿，德意志民族的先贤祠，基座七十七号。这座圣殿隐匿在巴伐利亚多瑙镇的山丘上，周围松柏满谷。多瑙河在它脚下静静远去，它俯瞰多瑙平原的绿野良畴，天低树远，一派庄严。它远避尘嚣，远避煊赫的声名，屹立于静穆之中，因为那些伟大的灵魂知道，静穆才是永恒。

附注：

一、感谢美国布雷德利•雷曼先生概允我自由引用他的文章。

二、文中所引图里克，皆出自她著《巴赫演奏指南》，有盛原先生译本，人民音乐出版社。

三、卡夫卡的话，引自他的《致父亲》一书，有张荣昌先生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四、文中所引歌德诗作，系梁宗岱先生译《流浪者之夜歌》。

谨致谢意。

（文章原载于《读书》2011 年 7 月号）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明┫

A：928 深夜致友人

A，在港大陆人。

“

白天又和一波在大陆的朋友，或者在香港的大陆朋友，快要走到关系尽头。你知道的，他们当然不是脑残，也不是白痴，他们是大陆或香港或外国一流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博士，教育背景很好，专业遍涉文理工商社科医法。他们是我的朋友，是很好的人，只是对这一两年在香港发生的事，和我的看法、感受越来越不同。我没有和他们绝交，但我知道，有些选择注定此生不同。

”

刚从金钟回来。走到添马公园，朋友说，这大草坪，多好。

白天又和一波在大陆的朋友，或者在香港的大陆朋友，快要走到关系尽头。他们不是脑残，也不是白痴，他们是大陆或香港或外国一流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博士，教育背景很好，专业遍涉文理工商社科医法。他们是我的朋友，是很好的人，只是对这一两年在香港发生的事，和我的看法、感受越来越不同。我没有和他们绝交，但我知道，有些选择注定此生不同。

我一直在想这是为什么，我尝试回忆他们谈论这些时候的言语措辞、表情语气：



怀疑虚无的说：总以为真理在自己一方难免一叶障目，谁都不要觉得自己是对的，争取的东西一定是好的。蓝图有很多种，民主未必是好的。

深谋远虑的说：我尊重他们在做的事，但这样在策略上是无效的，只能导致更大的混乱。

利益考量的说：经济永远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香港没有筹码，在地缘政治上，世界局势上，它都是弱者。（好像一切不义的事情在这里都应该被默许，因为它是弹丸之地）

没有人喜欢被揭短，尤其当内心深处知道这是短。当他们离开中国大陆，总被人问，你知道六四吗？一连串名字、事件抛向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得这是善意的疑问。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挑衅，对他们判断力的挑衅，智力的挑衅，于是年轻的知识精英们对此非常鄙夷。他们会自信的说，我的国家很好。内心的不确定和空虚，也会化为一种愤怒：你凭什么站在道德高地上，用这样的优越感质问我？！

大陆人对苦难是有共鸣和感情的，对于那些他们认为屁大点事就闹的地方，很看不惯。同样都是人，我们一直这样生活也没见怎么样，你凭什么。我们有地沟油、毒奶粉，我们还是长大了；我们小学戴红领巾，大学考毛邓马，写的文章、做的杂志也比你们强，拿到外国名校 offer 的也比你们多，你们凭什么。文革过去也有杨绛、木心这样高贵的灵魂，极权国家反而有更丰富、优秀的作者。你们长着一张没有被欺负过的脸，过着媚俗的生活。

他们觉得只有忍耐，深深的忍耐，在自己尽可能的范围争取生存，博弈，有一天才有资格有资本和世界说不。他们说这条路很漫长，你们急什么。百年大计，岂容一时激进而毁于一旦。

去年，朱嘉明先生来中大，和卢思骋、张秀贤对话，题目是：关于理想的世代对话。他说，在欧洲教书这么多年，每次回到中国，那里的孩子总是那么沉重，没有欧洲年轻人的热情和轻松。（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热情和轻松，是在台湾）他说，你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政治迫害，没尝过饥饿的滋味，为甚么活得这么沉重，好像时刻在忧虑生存。如果父母吃过的所有苦，变得富裕了，是为了告诉孩子，你应该像我们一样隐忍，才能不再贫贱的活着，那真的太悲哀。

是，我们在还没长大的时候就老了。这样的印记太深太深，难以摆脱。他们说世界只认得那个成事者，于是他的手段也都是策略，变得正当。一个理想主义的 loser 注定会后悔的。他们不相信没有经济保障，可以过有尊严的生活，不相信正直、公益、不求回报。他们不能明白，西西这样的作家，许鞍华这样的名导演，也可以安于不买房子过着普通生活，他们不能明白，文人不做公知没有圈子，也可以活得很自在。因为确实没见过，见过也被骗过。



我想起《过于喧嚣的孤独》的结尾，面对进步的系统，无可逆转的时代，废纸打包工汉嘉最终把自己打包了：“我不去梅朗特立克印刷厂的地下室捆白报纸，我像塞内加一样，像苏格拉底一样，我选择了倒在我的压力机里，倒在我的地下室，也就是说在这里升天。虽然压板已在挤压我所在下巴底下的双腿和其他部位，我拒绝被赶出我的天堂，我在自己的地下室，没有人能把我从这里赶出去，没有人能把我调离这里。一个书角顶着我的一根肋骨，我不由得呻吟起来，我彷佛注定要在自己制造的刑具上认识最后的真理。”

今天我的选择纯属个人选择，你甚至可以说它处于某种自私，它不是行动策略，没有想过要为大多数人的明天。但这是我的选择，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甚至不苛求你理解的选择。

明天很令人担心，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今夜，还是祝所有人晚安。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推荐阅读】给香港学生的信——这夜，我选择了站哪一边

我们邀请了一位在港留学的内地生撰写一篇关于这场雨伞革命的文章。原本我们并没有特别期望，但收到文稿时，却令我们喜出望外，它在众多关于过去一星期事态的评论中脱颖而出。诚意和勇气就是有这种力量。这篇以笔名发表的文章如下。

身为一个在香港的内地人，我时常感受到香港人对我们的偏见和敌意，但同时我也明白香港人这些态度背后的无助。多年来，我一直在两个世界之间尴尬地过活；但这夜，我站在你们一方，因为你们正在做我连发梦也不敢做的事情。

我最初来港时，香港学生的政治意识和参与给我很深刻的感受。民主墙上的标语和留言、大学师生在课堂内外经常议论时政，反映学生在带领社会进步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时我会被人问到内地的政治环境，甚至我自己的立场，我觉得这些问题很难答，不但是因为情况太复杂，难以三言两语清楚解释，更是因为我对这些议题无知。然而，我很欣赏你们关心社会，以及愿意真诚地接触旁人。反观我们内地人，不只甚少关心香港的事情，我们甚至不了解我们自己的事情。粗略估计，十个内地大学生，都没有一个知道内地的领导人是怎样选举出来的。在我们的观念里，甚至不会考虑选举过程的认受性和正当性。我们不知道原来可以问："我们想要甚么？"但我们却把这种沉默美其名为"成熟"。

这夜，我见到的不只是激情和参与。我还见到我从未经历过的坚定和团结，这是在中国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的东西。罢课和占领刚开始时，我估计那不会维持很久，更没有想过会演变到现在这个规模。然后我见到黄丝带从大学蔓延到整个香港，带着黄丝带的不只学生，还有教授、刚下班的人们、步履蹒跚的老婆婆。我见到群众拒绝被催泪弹驱散，反而把平凡不过的雨伞变成悲壮的符号。我见到你们整天跑来跑去，把食物和饮品分发给你们根本不认识的人。这夜，我看见你们成为兄弟姊妹。

我问自己，我在家中何曾见过这种景象？除了大学入学试，我们何曾为过同一个目标而并肩作战？很遗憾，我这半辈子从未试过，你们可以怪责我把勇敢当作愚蠢、把勇气看成天真吗？有人说，这不是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但坦白说，我们何曾处理过什么？我无法掩饰我的确很羡慕你们有抗争的机会。我现在二十多岁，也就是众多将要成为社会中流砥柱的年青人之一，可是，我们从来不知道有如此的一个选择。



你们在这场革命中展现的沉着和自律，亦令我感受非常深刻。在占领区域，我看见同学们藉着手机的灯光来读书、自发清理地上的垃圾和分类回收。在你们的行动指引中，我看到“避免肢体冲突，还要避免心中生起仇恨”。我见到横额写着“平等、忍耐、爱与关怀”。最难做到的，或者是保持冷静和理性，尤甚是对于愤怒的年青人来说。但你们已从过去的经验吸取教训，你们知道这才是最大的武器。这夜，你教晓我成熟的真正意义。

我的一位社运朋友告诉我，她并不真的认为非暴力的占领中环运动会带来我们想要的结果，她只是希望自己的意见被听见和令更多人关注，那么终有成功的一天。我无法想像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能维持盼望，而且只是盼望。但我知道，你们就是这样来到今天。我们也在途上。

我明白在你们勇气背后的恐惧，如果你们现在甚么都不做，有朝一日你们将会变成另一个我。坦白说，这也是我的恐惧。在一个如此繁忙挤迫的城市，你们没有屈服于种种包袱，仍然保持着对民主和自由的信念，信任群众的力量，这是香港令我着迷之处。我不敢想像，假如没有了街上声嘶力竭的呼喊，没有了空中激昂挥动的拳头，这个城市将会变成怎样。

此刻，我坐在你们身旁，我知道我所感受到的心痛和愤怒远不及你们的千分之一。我们无法知道形势是否会好转、未来是否会更光明，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现在拥有的东西——勇气、盼望、团结和自律——是何等的可贵。你们不会知道，在世上暗角的人，包括我，是如何渴望拥有这些东西。它们是光荣，也是恩典。为了你们的盼望，也为了我们的盼望，请继续守护它们。 这夜，我站在你们这一边，直至民主的曙光来临。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菲利斯·里奇曼：女性的生活与事业 —— 一封52 年后致哈佛教授的回信

“

1961 年你的来信让我很是消沉，不过我并未因此沉沦下去。虽然与我同时代的女性做出过非凡的事业，但她们大部分必须冲破障碍才能做到。收到你来信前，我从未想过婚姻可能阻碍我被哈佛录取或我的事业。当时那封信让我非常气馁，我想最后我甚至没有完成申请，因此后来我们面谈之时，我亦畏而无力反驳。那时我不知该如何按你的要求提笔。但如今，两段婚姻，三个子女与一份成功的写作事业让我得以对你在信中的顾虑‘有话直说’，正如你写的那样。

”



菲利斯·里奇曼，曾于1976 年至 2000 年任《华盛顿邮报》的美食评论人。

【哈佛来信】

1961 年 6 月 21 日

亲爱的里奇曼女士，

虽然我们还没收到你在布兰迪斯大学的官方成绩单，但基于你的介绍信，你有希望收到城市区域规划学院的录取。

不过，有话直说，根据我们一直以来的经验，就算是天资聪颖的学生，已婚女性很难再按原计划实行研究，而且感觉自己花在专业领域时间和精力有点像白费了。（对所有本科以上的专业研究来说都是这么回事。）



因此，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也为了帮助我们做出最后的决定，你能否尽快写给我们一两页计划，专门谈谈你准备怎样结合你在城市规划领域的专业生涯与你对丈夫以及未来家庭的责任？

真诚地，

威廉姆•A•德贝尔；助理教授

谨代表学院

【52 年后的回信】

2013 年 6 月 9 日

亲爱的威廉姆•A•德贝尔，

抱歉过了这么长时间才回复你 1961 年 6 月的来信。如你曾预见的那样，我一直非常忙。最近在清理几箱纪念品时，我偶然看到了你的来信，这才想起来虽然我们 52 年前当面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从未做过书面回复。

1961 年你的来信让我很是消沉，不过我并未因此沉沦下去。虽然与我同时代的女性做出过非凡的事业，但她们大部分必须冲破障碍才能做到。收到你来信前，我从未想过婚姻可能阻碍我被哈佛录取或我的事业。当时那封信让我非常气馁，我想最后我甚至没有完成申请，因此后来我们面谈之时，我亦畏而无力反驳。

那时我不知该如何按你的要求提笔。但如今，两段婚姻，三个子女与一份成功的写作事业让我得以对你在信中的顾虑“有话直说”，正如你写的那样。

我还从没见过哪个女人“感觉自己花在专业领域时间和精力有点像白费了”。我从没为哪怕一节课后悔过。我的研究生涯共计十余年，虽然都是半工半读，因为我还有“对丈夫的责任”（正如你当年的敏锐洞悉），其中就包括在他做研究项目的十年里我对他的财政支持。

你认为婚姻和家庭将阻碍我事业发展，这似乎让你的立场更具说服力了。但我认为被哈佛录取本来可以推动我的事业发展到和我丈夫相同的水准。虽然最后看来我专业生涯一切都很值得并且丰富多彩， 但你的来信却恰恰表明在我的事业刚刚起步时，哈佛根本没有给予它应有的尊重，更别提尊重我的丈夫、家人和我自己了。

我们搬到了费城，这里有顶尖的城市规划学院，著名的规划委员会，一开始我羞得不敢做规划有关的工作。我那时对申请杂志撰稿相关的工作更有信心，因为我有一些新闻从业经



历。一个编辑告诉我，虽然因为我是女人他可以少付一些钱，但这样来省钱并不是很划算，因为我很可能不会像男人一样长期任职。另一个告诉我他不能为“不可抗因素”去冒险，意思当然是说我可能会怀孕。

最后我找到了在费城城市规划委员会做研究员的工作，后来又参与了一个关于无家可归者重新安置的项目。两份工作都让我有机会每学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修一两个规划专业的课程；我没有完成这个研究生项目，因为那必须要我全日制参与课程。

如你预期的那样，一个“未来的家庭”在我与丈夫阿尔文婚后第五年成为现实。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我请了假来照顾他——就像 1961 年我们谈到的你第一任妻子当时全身心在做的那样。你也许不记得了，但你就是以她为例来解释已婚女性的教育可能是浪费。我猜这是时代赋予你的狭隘。Google 告诉我，你的妻子拿了两个硕士学位，一个博士学位，在学术研究，会议策划和社会行动等领域均有出色表现。你还依然认为她的研究生课程是浪费时间吗？

上世纪 60 年代女性的事业之路常常走得缓慢而迂回。我丈夫去了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教政治学，而我在那时转向了社会学。普渡大学的城市规划专业设在工程学院下，更注重物理方面的规划，比如建筑，设计和土里利用，而我的兴趣更多在于人以及规划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的影响。

1970 年，我们搬去了华盛顿，然后继续我漫长的硕士研究，但在论文遇到最后关头的障碍时放弃了。在抚养孩子的那些年，我非常擅长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可以背着他一起去处理事务。两个孩子的时候，我依然能应付自如，比如我一边给他们喂奶一边做研究，或是在游戏场边上看我的功课。三个孩子的时候，还有一篇关于儿童对种族认知的硕士论文，我有些忙不过来了。我需要有人来照顾孩子，但是雇一个人似乎太奢侈了，因为我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收入。因此我装修了家里的阁楼，在地下室加了一个厨房，为大学生提供免费的住宿，条件是他们帮我照顾孩子。

我发现，自由撰稿和带孩子完全没有冲突。我在哪儿都能写作——在岩溪公园里，孩子们在一旁抓青蛙和蜥蜴；深夜在家里，孩子们已经睡下。如果我要写的话题是类似比较购买冰淇淋或微波炉家用测试，我可以在收集素材的同时喂饱孩子，逗他们玩。

我快 30 岁才有孩子，那时我正在事业发展期，以不同的条件来换取临时保姆、拼车、做饭等把我的生活变得很复杂——但这也让我变得灵活、有弹性。（我甚至写了一本关于交换物品的书。）



70 年代中期，我正在为《华盛顿邮报》写文章，类似美食节，假日集市，少数民族市场和家庭烹饪等话题。我小心翼翼地向少数全国性的杂志打探，没想到《时尚先生》买下了我“水门美食家”的创意：从餐厅的隐秘性和谨慎的角度评价水门事件中那些被点名的餐厅。

我与别人合著过一本华盛顿杂志的餐厅指南，条件是我可以在那本杂志的美食评论家退休后顶替他的位置。但后来编辑却选了一个从没写过餐厅评论的男人。我并不是很意外。第二年，《华盛顿邮报》雇了我做餐厅评论员。我是第一个在报纸担任这个职位的女人，也是当时国内少数几个在报纸杂志工作的女人之一。

哪怕在美食写作这个领域，我也发现有性别区隔。说起家里的食物，人们认为这是女人的领域。当涉及阅历和金钱时，男人才是作者。女性写关于烹饪的话题；男性则写关于厨师的。

我在《华盛顿邮报》工作了 23 年，有时也会负责美食版。再后来，当只有一个孩子在家了，我离婚了，没有丈夫再需要我“负责”了，这时候生活似乎慢了一些，于是我在任务清单上加了三本小说的计划。

那些年我忙得不可开交，但也非常快乐。我开车送孩子们上学，因为我珍惜那些和他们在车里共度的时光。下午三点我赶回家里，这样他们回来的时候能见到我在。学生房客们负责晚餐，通常是按他们为我试验过的菜单。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很晚才出门去餐馆；他们足够大的时候我则很早便出门，这样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刚好醒来。

毫无疑问，我的职业生涯充满了幸运：在正确的时间来到了正确的城市，得到来自家庭与朋友的强力支持，发觉写作对于自身是快捷简单的事，还有别的不计其数的命运的意外。而且在我离婚后，我更加感谢我的工作同时为我带来了社交生活。

从这种意义上说，德贝尔教授，你的信让我没有走上城市规划的道路，而是开启了我的写作之路。有人或许会说这是运气好，我却宁愿说，如何平衡家庭生活与研究生学业的选择权本应该是我的。

幸运的是，在写作方面，我性别的影响要在比别的大部分工作里都小。人们越来越多地从自由撰稿人写的东西来判断他们，而不是别的因素。即便是在我事业势头正好的时候，我遭到的性别歧视也从来没停过。我的其中两个孩子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在私立学校上学。那之后不久我接到了一个任务，去中国待两周，写那里的餐厅。在 1980 年，这种机会非常稀有。我的丈夫决定一同前往。学校把我们召了去，纠缠说我抛弃了孩子，尽管我已经安排



了三个大学生留宿在家里帮我照顾孩子，而且还有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做后盾。老师们极力劝说我取消行程。没有一个人指责了我的丈夫也要离开。

我们都去了中国。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孩子也都长大成人，成为了我所有能期待的人——做了专家，成为公民，为人父母。他们也很喜欢我的事业，在我退休后可能比我还想念那些日子。我被一种“慢性疾病”占据了我的生活：我有了新的身份，时而写作，时而是社区的活跃分子，有了一位新的（开明的）丈夫， 新一辈的孙儿孙女。

德贝尔教授，我猜你现在对女性的观念更开放，并且更欢迎她们、甚至鼓励她们进入你的领域。至少这是我从你 2010 年的一次演讲中会做出的猜测，当时你因为 40 年服务于罗博学者环境研究基金而受表彰，你说：“随着时间流逝，将会有一种浪潮指引着招生委员会去跨越那些经验上可靠的选择。”你恳请你的校友们“要坚持让招生委员会去冒险”。

你学校的女性学生正在磨练她们的社会活动能力。两个哈佛设计研究生学院的学生为建筑规划师丹尼斯•斯科特•布朗的情愿征集了一万多个签名。我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上她的课时她已经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老师。她后来和建筑师罗伯特•文丘里结婚，两人在 1967 年开始尝试的建筑实践影响深远。

1991 年，文丘里得到了建筑界的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奖。但布朗没有得到，不管是那时还是之后。但阿丽尔•阿苏丽纳-里希腾，也就是和卡罗琳娜•詹姆斯一同发起请愿的女生说：“几乎所有的建筑学学生都在学校里学习过她的著述。每个人都在这位女性专家的帮助下成长，但她从未获得真正的认可。”

德贝尔教授，您为请愿签名了吗？

真诚的，

菲利斯•里奇曼[1]

【哈佛回信】

亲爱的菲利斯•里奇曼，

我 1961 年的给你的信提到，你很可能被哈佛的城市规划项目录取，但是考虑到令人满意的职业生涯很可能与潜在的家庭责任发生冲突。

你那时正要开始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我认为让你明白读研后的情况，就像我当时对读研的理解一样，对你是公平的。



我今天不会再写出这样的信。虽然还远不尽人意，但我相信，今天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女性的工作环境要远远好于 1961 年。

真诚的，

威廉姆•德贝尔[2]

［1］菲利斯・里奇曼曾于 1976 年至 2000 年任《华盛顿邮报》的餐厅评论员。她写过三本食物探秘类书籍，以及不少烹饪书。

［2］威廉姆・德贝尔于 1960 年至 1997 年任教于哈佛大学，现为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的名誉教授。

（译文来自译言网，译者：豆牙蛋）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慕容雪村：致黑暗中的弄权者



慕容雪村，作家，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等。

“

我知道，这封信将成为我的灾难。我的作品将难以出版，我的话语将被剿除干净，我的道路上将布满你的荆棘，我曾经对这一切感到恐惧，但告诉你吧，我现在已经不怕了。我会一直站在这里，等着看阳光照亮世界、照亮人心，也照亮你的栖身之所。这就是我和你的区别，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我相信未来，而你只拥有现在。

”

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

2013 年 5 月 11 日，你下令封杀了我在新浪、腾讯、网易和搜狐的微博；5 月 17 日下午，你又使我在新浪的微博悄悄恢复了；时隔 8 小时，到 5 月 18 日凌晨，我的微博帐户再次遭遇全线封杀。整个过程你变化莫测，既也没有做出任何解释，没有任何人给我通知。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也不知道你属于哪个机构，甚至不知道你是男是女，但我知道，你一定会看到这封信。

在你眼里，我只是一个可以随时注销的用户。但对我而言，这四个微博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这里有我的亲人和朋友，我们互致问候，谈天说地，有时也开开玩笑。这里也是我最重要的言论平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我获得超过 8，500，000 位读者，一共写了 20 多万字，每一个字都经过精心的推敲，其中有读书笔记、生活感悟、时事评论，以及一些倏然而来的灵感。这些作品没有触犯法律，也没有威胁到任何人的安全，它们不该被销毁，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你可能不会明白，对一个作家而言，作品有时比他的生命还重要，而在 5 月 11 日的夜里，只因为你的一句话，这一切都被封锁。

我确信你有自己的理由，不管这理由是什么，我都希望你能明明白白地告诉我，然后对我说一声“对不起”。我知道你手握大权，但你无权销毁我的作品、侵犯我的生活，还有更重要的：你无权剥夺我的言论自由，这是我的神圣的宪法权利。我知道，在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我远非你的敌手，我只是一介平民，一个靠微薄收入维持生计的作家，而你只需要拿起电话，就可以将我推进深渊。但我还是要坐下来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相信，你的权力只能肆虐一时，却必不能肆虐永久。你可以删除我的言论、注销我的名字，却不能夺走我手中的这支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这支笔将长久地与你对抗，你不可能永远地栖身黑暗，黑暗也不可能永远地庇护于你，总有一日你会暴露在阳光下，到那时，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我会让全世界都知道你的名字。

长久以来，你和你的同僚致力于压制中国的言论自由，你们设置了无穷无尽的敏感词，删除了难以计数的文章，封杀了成千上万个用户，你们筑起高墙，把世界挡在墙外，把中国变成一座信息的监牢。你们审查文章、删除言论，把文学当成毒药，把言说当成犯罪，把每一个优秀的脑袋都视为自己的天敌。 在你们的努力之下，这 13 亿人口的国家居然没有一份真正的报纸，这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居然没有一寸畅所欲言的土地，这是你的丰碑，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假如这是一场战争，那么站在你枪口下的不仅是我。你正在与汉语为敌，与文明为敌，与整个国家的未来为敌。

也许你的心中充满正义，认为自己正在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我希望你能明白，这国家不仅属于你和你的机构，它是 13 亿人共同的国家，它的安全应让所有人免于恐惧，而不只是让有权者放心满意。它的稳定应基于人们的幸福和自由，而不是举起枪逼迫他们服从；它的和谐应让万籁鸣响，而不是扼住人们的喉咙。你的权力本应保卫人民的自由，而不是将之夺走；你的职责本应让语言更加美好，而不是让它枯萎凋零。

在未来的某一天，你或许会这样为自己辩解：我知道这是错的，但我必须履行职责 。这或许可以减轻你的罪责，但并不能免除你的道德责任。在被你封杀的我的微博上，有这样几句话：“如果你是柏林墙边持枪的守卫，看见有人翻墙，你的责任就是把枪口抬高一点；如果你是 1960 年独自巡逻的民兵，看见饥民逃荒，你的责任就是放他们一条生路。如果你是城管，看见小贩四散奔逃，你的责任就是跑慢一点。当履行职责成为一种罪恶，就会有比职责更值得遵守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现在我将这段话送给你，希望在下一次封杀时，你可以跑慢一点，枪口可以抬高一点。那是你的良心，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

或许你会说：我不是主动做恶，我只是在执行命令。这不是理由，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你已经是个成年人，有眼可以看，有耳可以听，有脑袋可以思考，当你执行命令，也就意



味着你赞同和支持这个命令。如果你知道它是错的，请回答我，你为什么还要支持？为什么还要赞同？事实上，你做这一切只是为了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而且你不会停手，现在我已经付出了代价，请告诉我，为了满足你的欲望，你还需要多少牺牲？

请记住下面这些名字：

冉云飞，作家、学者；

张雪忠，大学教授；

肖雪慧，大学教授；

宋石男，学者；

何兵，大学教授；

斯伟江，律师；

沈亚川，记者；

项小凯，学者；

吴伟，学者；

吴祚来，学者；

滕飚，律师、学者；

……

短短几天之内，这些名字所属的微博帐户相继消失于你的枪口之下。如果我愿意，这名单可以列得更长，这是你的丰碑，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现在请你再读一遍，然后把手放在心口，告诉我、告诉你自己，也告诉天下人：这些人犯了什么罪？你为什么要销毁他们的作品、封杀他们的名字？你根据何种程序、何种标准、哪条法律扣动扳机？

是的，人们害怕你黑暗的枪口，每一次可耻的封杀之后，都是长久的沉默。这沉默让你更加坚定、更加执著，也更加残暴。但这并非你的胜利，因为千万人正在沉默中愤怒、挣扎、诅咒，沉默中正酝酿着滚滚的雷声。我希望从今而后，你的每一次封杀都能收到这样一封信，等到你卸任之时，这些信将垒成一座巍峨的山峰，你将永远背负着它。这是你的丰碑，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

我知道，这封信将成为我的灾难。我的作品将难以出版，我的话语将被剿除干净，我的道路上将布满你的荆棘，我曾经对这一切感到恐惧，但告诉你吧，我现在已经不怕了。我会



一直站在这里，等着看阳光照亮世界、照亮人心，也照亮你的栖身之所。这就是我和你的区别，不愿透露姓名的先生：我相信未来，而你只拥有现在。

长夜将尽，愿你心安。

（本文原载于纽约时报中文网）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思┫

周保松：我的自辩：抗命者书（上）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著有

“

记者也过来问我为何要坐下来，我想了好一会，说这是为了成全自己的人格。我觉得，如果在某些重要时刻，如果你经过深思熟虑后仍然愿意坚持某些价值，那必然是因为这些价值对你极为重要，甚至构成你人格的一部分。为了这些价值你可能要付出很大代价，但的确是在成全自我。这种成全，不是向别人交代，而是向自己交代，向自己内心的信念交代。

”

我是 2014 年 12 月 11 日下午五时零一分，在金钟夏悫道被香港警察正式拘捕，罪名是“非法集结”和“阻差办公”，于我则是选择公民抗命，并承受刑责。在我的人生规划中，从来没想过会行到这一步。而这一步跨出后，对我日后人生有多大影响，此刻也无从预计。但趁记忆和感受仍在，我希望将经历和反思如实记下来，为历史留点纪录。

我决定响应学联号召，在警方清场时和平静坐直至被捕，是 12 月 10 日晚上八时多的事。当时我一个人，在干诺道中人来人往的天桥石壆上，看着泛红的天空，静静躺了大半小时，觉得已想清楚，心里踏实，竟然沉睡了一会。醒来，见到有个女孩子蹲在马路上，一笔一笔画着一个叫“天下太平”的大图案，里面有一把一把的黄雨伞。我一时有感，也在地上拾起两枝粉笔，走到无人之处，写下“我们没理由悲观，我们非如此不可”两行字。



站在高处，看着下面灯火依然通明的自修室，以及四处留影不舍的人群，我知道，这是最后一夜。

回到家，已是深夜，我告诉妻子我的决定。经过好几回讨论，我最后总是说，我没法不这样做。妻知我心意已决，不得已地说，但愿你明早起不了牀，而到你醒来时，一切已经过去。早上八时半，我起来，三岁女儿正要出门上学。我抱着她，说爸爸今晚不能回来吃饭，很对不起。我特别叮嘱妻子，不要告诉女儿爸爸的事，免得留下童年阴影。最近这个月，她在电视上见到警察，就会大叫“警察拉人”，声音中带着恐惧。

回到金钟，已近十时。步出地铁站，阳光普照，世界却已不再一样。夏悫村一片狼藉，连侬墙上万千的心愿已经不见，只剩下“We are Dreamers”三个字，孤零零挂在墙上。原来写着“就算失望，不能绝望”的外墙，现在只余“初衷是爱”四个大字。字是白色的，纸是黑色的，墙是灰色的。9 月 28 日，我就在这道墙数步之外，撑着伞，与无数市民一起，亲尝第一枚催泪弹的滋味。当时，我不曾意识到，那是香港历史转捩的一刻。我更不可能料到，七十五天后，我会穿上政政系系衣，和无数市民一起，挤着地铁回到金钟——他们去上班，我去等被捕。

我在墙前默站良久，在阳光中，见到 Johnson（杨政贤）和 Eason（钟耀华）从远处联袂走来。两人都是政政系学生，中大学生会前会长。Johnson 是民间人权阵线前召集人，Eason是学联常务秘书，与政府谈判的五名学生代表之一。在接着下来的清场当中，Eason 是第一批被捕，Johnson 是最后一批。我们没有多说什么，只在一张“We will be Back”的条幅前留下一张合照，便一起向着夏悫道和添美道方向走去。在那里，一众抗命者早已坐在地上，等待最后时刻。

港府从“权威”堕落到“权力”

去到现场，我才发觉人数很少，坐着的也就二百来人，远较围在外面的记者和旁观者少。我更料不到的，是泛民派很多立法会议员也来了，李柱铭、黎智英、余若薇、杨森等也在。这和我昨夜的想像很不一样。我本来以为，会有许多年轻人留下来的。但我对此并不失望，甚至隐隐觉得庆幸。年轻人的付出已经够多，实在不必再有更多磨难。但真要深究原因，我估计，经过这两个多月，年轻一代对于公民抗命的理解，已经有了根本转变。如果将卢梭在《社会契约》中的话倒过来说，就是香港政府经历了一场深刻的从“权威”（authority）堕落到“权力”（power）的过程。没有正当性的权力，最多只会使人恐惧屈从，但却无法产生政治义务。而当公民不再觉得有服从的义务，公民抗命中最核心的“忠于法律”的道德约束力便会大大减弱。



就此而言，港府管治的正当性危机，经过这次运动，已经发生根本转变。之前的危机，源于权力没有得到人民的投票授权，但人们仍然愿意有条件地接受，因为权力机构在相当程度上仍然能够自我约束并符合一些基本要求，例如谨守程序公正和专业伦理。现在的危机，是当局以不受约束的姿态恣意滥用公权力，遂导致权力正当性的进一步丧失，结果必然是更为广泛的政治不服从。

我最初坐在后面，但后来觉得既然是要陪伴学生，和他们在一起会好点，遂移到第二行最右边。坐在我旁边的，是一名叫 Mena 的年轻女孩。我以为她是学生，问起才知道已在职，从十月起便已在学联帮忙，是众多义工中唯一选择坐下的一人。我问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她说因为这样做是对的。我再问，你父母知道吗？她笑了笑，说早上用了一个小时说服妈妈。和我同排的，还有周博贤、何芝君、何韵诗、罗冠聪等，再远一点有我以前的学生黄永志和中大同期同学蒙兆达和谭骏贤；而坐在我后面的，有韩连山、毛孟静、李柱铭、李永达等。然后我发觉，今天坐下来的，不少都有政党和 NGO 背景，像我这样的“独立人士”好像并不多。

为什么我们“非如此不可”？

因为警方清理障碍物进度缓慢，所以中间有好几小时，我们是坐在原地等待，听着警方一次又一次用广播警告留守者必须尽快离开，并逐步封锁占领区。但现场气氛并不紧张，大家好像在等待一件必然会发生且知道会怎样发生的事，遂没有过多的焦虑和恐惧。我虽然内心平静，但在某些时刻，当我坐得累了，站起来看着密密麻麻的记者，看着不远处严阵以待的警察，看着天桥上俯视下来的旁观者，再低头看看身边一脸疲惫的学生时，总难免浮起几分迷惘伤痛：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为什么其他人不在这里？为什么我们的“非如此不可”，在别人眼中却是如此毫无所谓？香港这个城市，真的值得我们为她这样付出吗？

我必须老实承认，在警方开始拘捕行动时，我脑里真的想过，只要我站起来，走出去，我就不再是“他们”，我就可以坐地铁回到校园，重回我的安稳生活。眼前需要承受的一切，本来并不属于我的世界，我也没有对人做过任何承诺，为什么非要坐下来不可？我问自己。

这其实是我这两个月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想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那么多年轻人站出来，走上抗争之路，甚至愿意为此付出极大的个人代价。那当然不是受人唆摆，或为得到什么个人利益。根据郑炜和袁玮熙早前做的一个颇有代表性的占领者调查，参与运动且坚持留守中占最大比例的，是教育水平高且收入不错的年轻白领和专业人士（超过55%）。按道理，他们已是既有游戏规则的得益者，如果只为个人着想，他们实在没有理由



这么做。他们站出来的主要原因，是“要求真普选”（87%），即自由平等的公民能够行使他们应有的政治权利。

最深的政治觉醒：权利与尊严

但民主对他们为何如此重要？不少人马上会说，那是因为民主能为他们带来其他好处，例如更好的经济生活或向上流动的机会。就此而言，民主只有工具性价值。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没有太大说服力。我相信抗争者会更愿意说，他们如此在乎，是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给人平等尊重，才能让人活得有尊严。但这并不是说，尊重和尊严是一些抽象的理想的中产的“后物质主义”追求。绝非如此。人们正是在具体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真实感受到制度加诸其身的不公正不自由，才慢慢体会平等尊严的政治可贵。

我因此认为，这些价值之所以能成为人们行动的理由，必然是因为，这些价值早已以某种方式走进他们的生命，并成为他们理解自我不可分割的部分。唯其如此，他们才不愿意别人用经济利益换走他们的政治权利；也唯其如此，当他们视为应得的政治权利被粗暴剥夺时，他们才如此深切感受到尊严受损。也许这个才是这次雨伞运动中，青年人最深的政治觉醒。对于统治者和许多成年人来说，也许这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世界。他们无法理解，人除了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人除了要面包，还要权利和尊严。新的一代，不再愿意用旧的价值范式去理解自身和理解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当观念改变，行动就跟着改变，新的主体就会形成。任何不能有效回应这种政治自我的表达和实践的制度，都会受到极大挑战。这个过程要经历多少苦痛和承受多大代价，是我们所有人——尤其是当权者——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向自己内心的信念交代

正是受这些问题困惑，在我当天的背包里，除了衣服和水，我还带了一本 Christine Korsgaard 的 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规范性的起源》）。当时《伦敦书评》一名记者好奇，走来问我读什么书，我们遂在一片嘈吵中聊了一会道德和身分的问题。《独立媒体》的记者也过来问我为何要坐下来，我想了好一会，说这是为了成全自己的人格。我觉得，如果在某些重要时刻，如果你经过深思熟虑后仍然愿意坚持某些价值，那必然是因为这些价值对你极为重要，甚至构成你人格的一部分。为了这些价值你可能要付出很大代价，但的确是在成全自我。这种成全，不是向别人交代，而是向自己交代，向自己内心的信念交代。



我相信，在这场运动中，每一名认真的参与者，都经历过这样的觉醒和反思，并在最后做出自己认为对的道德选择。所以，在广角镜下，我们很容易只见到波澜壮阔，却见不到一个一个真实个体如何在其中真实踏实地活出他们的信念。清场前夕，我多次站起来，细细凝视每一张脸。有三张脸，我印象特别深刻。

区龙宇，退休教师，一生关心工人权益，两袖清风，好读书，为人爽朗正直。十九年前，我们在英国初遇，曾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激辩两天两夜。这场运动一开始，他便全情投入，在面书和年轻人自由讨论交锋，在各占领区踏实做事，完全不像一个“六十后”。当天他握着我的手，说，我老了，无所谓。你还年轻，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应好好考虑是否值得留下来。

周豁然，中大人类学系学生，人如其名，豁达安然，喜欢耕田，关心环保，是中大农业发展组核心成员，更积极投身土地正义联盟的各种行动。6 月 20 日反东北发展集会后，她首次被捕。7 月 2 日清晨，我在遮打道，亲眼看着她再次被警察抬走。9 月 28 日，她在示威现场最前线。她后来告诉我，她当时选择了不戴眼罩不撑雨伞，直面警方的胡椒喷雾和催泪弹。当天她和朱凯迪、叶宝琳等坐在最后面。我走近她，细声说，你已被捕两次，这次就不要了吧。她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朝云，公民记者，人瘦削，脸苍白，眼中常有忧郁。占中运动开始后，他辞去工作，全程委身，无役不与。将来人们回望，或许会见到，如果没有朝云的摄影和文字，我们对这场运动的认识，将会很不一样。但朝云不仅仅是纪录者。预演占中，他被捕；旺角清场，他被捕；金钟清场，他留到最后，按下最后的快门，将相机交给朋友，被捕；铜锣湾清场，再次被捕。当天，我们没有机会交谈。我们隔着人群，遥望对方，彼此相视而笑，然后道别。

能够和这些朋友一起，是我人生最大的福气。谢谢你们。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Beryl，李佳凝

设计：潘雯怡，季文仪，池春荣

校订：童亚琦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除了 Co-China 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